



海外汉学丛书

T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

by William Hung


杜甫

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洪业著

曾祥波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海外汉学丛书

T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

by William Hung

杜甫

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洪业 著

曾祥波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 洪业著；曾祥波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2
(海外汉学丛书)
ISBN 978-7-5325-7164-2

I. ①杜… II. ①洪… ②曾… III. ①杜甫(712~770)—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01820 号

海外汉学丛书

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洪业 著 曾祥波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启东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8 印张 25 $\frac{6}{18}$ 插页 3 字数 385,000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100

ISBN 978-7-5325-7164-2

I · 2784 定价：72.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出版说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直关注海外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出版了《海外红学论集》、《金瓶梅西方论文集》等著作，并与科学出版社合作出版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先生主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80年代后期，在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和海外著名汉学家的支持下，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了《海外汉学丛书》的出版计划，以集中展示海外汉学研究的成果。自1989年推出首批4种著作后，十年间这套丛书共推出20余种海外汉学名著，深受海内外学术界的好评。

《海外汉学丛书》包括来自美国、日本、法国、英国、加拿大和俄罗斯等各国著名汉学家的研究著述，涉及中国哲学、历史、文学、宗教、民俗、经济、科技等诸多方面。提倡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和富于创见的研究精神，是其宗旨，也是这套丛书入选的标准。因此，丛书入选著作中既有不少已有定评的堪称经典之作，又有一些当时新出的汉学研究力作。前者如日本学者小尾郊一的《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和自然观》、法国学者谢和耐的《中国和基督教》，后者以美国学者斯蒂芬·欧文（宇文所安）的《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为代表，这些著作虽然研究的角度和方法各有不同，但都对研究对象作了深入细微的考察和分析，体现出材料翔实和观点新颖的特点，为海内外学术界和知识界所借鉴。同时，译者也多为专业研究者，对原著多有心得之论，因此译本受到了海内外汉学界和读者的欢迎。

近十几年来，在中国研究的各个领域，中外学者的交流、对话日趋频繁而密切，中国学者对海外汉学成果的借鉴也日益及时而深

人，海外汉学既是中国高校的独立研究专业，又成为中国学人育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取资对象。新生代的海外汉学家也从专为本国读者写作，自觉地扩展到以华语阅读界为更广大的受众，其著作与中文学界相关著作开始出现话题互生共进的关系，预示了更广阔的学术谱系建立的可能。本世纪以来，虽然由于出版计划调整，《海外汉学丛书》一直未有新品推出，但上海古籍出版社仍然持续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海外汉学专题译丛，或从海外知名出版社直接引进汉学丛书如《剑桥中华文史丛刊》，积累了更为丰富的出版经验及资源。鉴于《海外汉学丛书》在海内外学术界曾产生过积极影响，上海古籍出版社听取学术界的意见，决定重新启动这套丛书，在推出新译的海外汉学名著的同时，也将部分已出版的重要海外汉学著作纳入这套丛书，集中品牌，以飨读者。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年3月

自叙

吾何以兴念而撰为此书也？予年方十三，家父即授以杨伦《杜诗镜铨》，语予云，杜子美志意宏远，心性桀倔，且多谐趣；嘱予曰：“其人也，天假其时，则显；运命未济，亦不衰。”既长，因予所学，遂以《圣经》为绝世之书。而仅次于圣《诗》者，即为杜诗，每能慰予之大悲大喜。四十年来，吟蕴其间，其亲近感激之心，沛然而与日增焉。

vii

壬午岁（1942），予縲继于日寇之囹圄，欲阅《圣经》而不可得，遂索杜诗一部——囊昔文文山（1236—1282）于元人狱中慨然引领而待死，集杜句成诗二百章。予臆可以效法焉——亦不获允。其时于晨昏祷思之中，已默定他日脱身后必所为之事若干，潜研杜诗即其一也。

丁亥至戊子岁（1947—1948），予再赴哈佛大学教席，授以杜甫行实。诸生喜焉，促予笔削以成编。戊子岁二月，又宣之于耶鲁大学伍德沃（Woodward）讲席。听者亦促予以英文撰为一书。今其书告成，吾之微愿，在增西人于诗圣之新知，藉此而于吾国吾民具同情之了解。

此书之成，燕京大学、哈佛大学及哈佛燕京学社与有助焉。学社社长叶理绥（Serge Elisseeff）教授使予得以潜研教习杜诗，尤致谢忱。此书刊印之资，学社一以承之。平日所过从之同侪友于，惠予良多，魏鲁男（James Roland Ware）教授、柯立夫（Francis Woodman Cleaves）教授以所藏罕见之本见示；学社和汉图书馆馆长裘开明（Alfred Kaiming Chiu）博士为予浏览群籍开方便之门；哈佛图书馆主事馆际互借之雷诺兹（Alice Reynolds）女史助予求籍于剑桥；燕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陈鸿舜君则每以此地不可得之文献资料见惠，此皆予所铭感在心者。

viii

此书之成，距今已二载余。其迟迟未能刊印者，皆因予下笔之际，未能厘清此书之撰，为汉学专门学者欤？为一般读者欤？叶理绥教授揆是而建言，析是书为二卷，一载正文，一载注疏。^① 哈佛大学出版社社长

^① 此卷载杜甫生平行实及诗章之译文。另有注疏一卷行世，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刊印（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刊行于壬辰岁〈1952〉）。

威尔逊（Thomas James Wilson）博士、校理都布森（Eleanor R. Dobson）女史，遣达夫（Chase J. Duffy）女史助予以成此事。是书之文章体制，多得其议谏，予于英谚习语时有扞格，达夫女史亦复一一正之，尤所感念。

吾撰是书，家中百事不问，而吾妻一力担之。是书之题献，固其宜也！吾所欲言者，杜子美已先我得之，曰：

“家贫仰母慈。”^①

洪煊莲

辛卯岁（1951）九月

剑桥，马萨诸塞

^① 译者按：引自杜甫《遣兴》。

目 录

自叙	1
引 论 “天吴及紫凤，颠倒在衽褐”	1
第一章 “记一不识十”（712—735）	18
第二章 “快意八九年”（736—745）	29
第三章 “骑驴三四载”（745—749）	45
第四章 “陵厉不飞翻”（749—752）	60
第五章 “故山归兴尽”（752—755）	72
第六章 “东胡反未已”（756—757）	90
第七章 “万国兵前草木风”（757—758）	115
第八章 “一岁四行役”（759）	130
第九章 “此生那老蜀？”（760—762）	148
第十章 “何地置老夫？”（762—766）	173
第十一章 “夔子之国杜陵翁”（766—768）	200
第十二章 “孤舟增郁郁”（768—770）	228
结 语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250
【附录一】 注疏卷自叙	253
【附录二】 洪业《杜诗引得序》	254
【附录三】 洪业《我怎样写杜甫》	345
【附录四】 洪业《再说杜甫》	365
索 引	375
洪业及其《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代译后记）	423
补 记	440

引论 “天吴及紫凤，颠倒在裋褐”^①

中国八世纪的诗人杜甫，作为中国的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②、莎士比亚、弥尔顿、彭斯^③、华兹华斯、贝朗瑞^④、雨果及波德莱尔，被介绍给西方。为何一位诗人会被比作如此众多、各不相同的诗人？质而言之，杜甫不能被视为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杜甫是独一无二的。

即使在成千上万的中国诗人当中，杜甫也是独一无二的。他是唯一一位随着时间流逝而声名与日俱增的诗人。在杜甫的时代，他并非广为人知，但当他去世四十年之后，诗人们开始意识到杜甫是最伟大的诗歌艺术大师之一，而一些诗人则毫不犹豫地认为他是最出色的一位。杜甫去世三个世纪之后，学者们真挚地搜集、编纂和注释他的诗作。在杜甫诗作的光照之下，他们开始研究其生平事件，从而将杜甫的诗作置于其生平与时代之中去理解。对杜甫诗歌的迷恋，引发了对杜甫个人的尊崇，而对杜甫生平细节越来越多的了解又进一步加深了对其诗歌的尊崇。

若干世纪以来，总有批评家挑出这个或那个在他们心目中优于杜甫的诗人。然而，绝大多数中国史学家、哲学家和诗人都把杜甫置于荣耀的最高殿堂；这是因为，对他们来说，当诗人杜甫追求诗艺的最广阔的多样性和最深层的真实性之际，杜甫个人则代表了最广大的同情和最高的伦理准则。如果列出杜甫作品选本和全集各种版本的目录，将数以百计。如果一份名单试图完全涵盖杜甫研究和注释的著述，则会数以千计。^⑤

① 引自杜甫《北征》。

② 译者按：奥维德（Ovid，BC 43—AD 18），古罗马诗人，著有《变形记》、《爱的艺术》。

③ 译者按：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象征苏格兰文化的浪漫派民谣诗人。

④ 译者按：贝朗瑞（Pierre Jean de Béranger，1780—1857），法国最早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民谣诗人。

⑤ 关于杜甫诗歌文本的传承和重要版本的价值比较，可以参见我为《杜诗引得》（哈佛燕京学社，汉学引得系列，NO. 14，1940年，3册）所做的序言。在本书的注释卷中，给出了每首英译杜诗在《九家注杜诗》中的卷数页码。以下列出的是本书使用的若干杜诗版本：（1）《九家注杜诗》，36卷，1181年。（转下页）

即使在今天的中国，当所有道德和文学的标准被抛进质疑和混淆之中，杜甫在人们心中的位置、他的魅力和他所受到的尊崇却依然如故，未曾经受挑战。一方面，那些主张绝对权力以维持现状的人士以杜甫为号召，因为他始终不渝地站在政府的立场上，毫不犹豫地反对叛乱。另一方面，那些支持流血革命的极端左翼人士也援引杜甫为例证，因为他描绘出了最为催人泪下的苦难场景，大声呼喊出对不公平现实的最为愤慨的谴责。一方面，研习文学的老派学生崇拜杜甫繁复典雅诗文中反映出来的渊博学识，那些词汇、典故来自于各种各样的历史和文学典籍，恰如其分地被用于他所要描写的主题和情境。他们如痴如醉于杜甫既能严格遵循不同诗歌体裁的格律，又能灵活变通地加以拗救处理。而另一方面，提倡打破旧习的学生，又为杜甫从形式和语言上大胆地涉及新内容而感到欢欣鼓舞。本国文学的鼓吹者指出，传统的文学语言束缚鲜活的情绪和创造性的思想，而杜甫常常使用方言俗语，由此他们骄傲地宣称杜甫是最早挑战僵死的文学传统语言的大师之一。如果要从古往今来的诗人诗作中去攫出这些字句篇章，不难看出杜甫的影响遍及外在形制与内在气质，这类例子成百上千。

想要了解杜甫的西方学生最好先参考《中国名人大辞典》（*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大体说来，此书极为便利，易于理解，由著名汉

（接上页）（2）《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32卷，以及仍王洙注，约1189年。1913年版。（3）《分门集注杜工部诗》，25卷，约1195—1224年。《四部丛刊》本。（4）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50卷，1204年。《古逸丛书》本。（5）黄鹤，《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36卷，1226年。此书为朱鹤龄和仇兆鳌所引用。（6）玉几山人，《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20卷，《文集》，2卷；1536年。（7）钱谦益（1582—1664），《钱注杜工部诗》（1667），20卷，据称以1133年吴若本为底本，但很可能只是1204年蔡梦弼本。（8）朱鹤龄，《集注杜工部诗》（约1667年），20卷。（9）张溆，《读书堂杜工部诗集》（撰于1673年，刊刻于1698年），20卷，我使用的是1841年版。（10）卢元昌，《杜诗阐》（1682年），33卷。（11）仇兆鳌，《杜诗详注》，25卷；《首卷》，1卷；《附编》，2卷。其于1703年被刊削，附录部分编于1711和1713年。我引用杜甫的文章都来自《杜诗详注》卷24—25。（12）浦起龙，《读杜心解》（1724），6卷；《卷首》，1卷。（13）杨伦，《杜诗镜铨》（1791），20卷。我用的是1872年的四川刊本。

学家、剑桥大学教授翟理斯 (Herbert Allen Giles)^① 编撰。在几乎所有欧洲语言关于杜甫的简短说明中，翟理斯对杜甫的描述留下的痕迹宛然可见。例如 1934 年，一本关于杜甫蜀中诗歌的选本被译为英文出版，序言中附有对诗人生平的介绍。许多说法都是逐字从《中国名人大辞典》中转袭而来的。

不幸的是，翟理斯的介绍颇难令人惬意。令人吃惊的是为何如此之短的篇幅中居然有如此之多的讹误？当然，其中有些讹误是这位博学的编撰者从中国学者那里承袭来的，这倒能轻易辨识；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少数荒唐可笑、颇为离谱的讹误，它们绝非源于中国学者。经过一番研究，我最终回溯到德理文 (d'Hervey)^② 和雷慕沙 (Remusat)^③ 同样不准确的说法，它们可能是西方语言中对杜甫生平加以研究的最早文字。此事见载于北京耶稣会传教士钱德明神父 (Father Amiot)^④ 撰述，并于 1780 年出版的《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纪录》(*Memoires concernant les chinois*) 第五卷。钱氏著书之后的一个半世纪中，西方学者屡有关于杜甫生平的文字问世。还好，总的来说他们的错误都比较少。不过，这些文字都没什么趣味。

在中国，若干世纪以来，对杜甫生平以及杜诗的理解经历了一个逐

-
- ① 译者按：翟理斯 (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曾任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领事馆官员。1891 至 1932 年，继威妥玛之后任剑桥大学第二任汉学教授。著有《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国通史》(*Histoire Generale de la Chine*) 四卷本、《中国和西方列强关系史：1860—1902》(*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Chine avec les Puissances Occidentales: 1860—1902*)、《中国名人大辞典》(又名《古今姓氏族谱》(*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等。
 - ② 译者按：德理文 (Marie - Jean Léon d'Hervey de Saint - Denys, 1823—1892) 雷慕沙得意门生儒莲的学生，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第三任教授。1862 年在巴黎出版《唐诗》(*Poésies de l'époque des Thang*)，被认为是法国出版史上第一本介绍中国古典诗歌的选集。
 - ③ 译者按：雷慕沙 (Abel Remusat, 1788—1832)，法兰西学院首任汉学讲座教授，著有《新亚细亚杂纂》(*Nouveaux Melanges asiatiques*)。
 - ④ 译者按：钱德明 (Amiot Jean Joseph Marie, 1718—1793)，字若瑟，法国传教士，著有《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纪录》十六卷 (*Me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oeurs, les Usages, etc. des Chinois: Par les Missionnaires de Pékin*)。

渐增长的过程。这一发现的过程远远没有结束。直到公元813年，第一次介绍诗人生平的文字才问世。它遗漏了关于其生平的许多重要事实，比如生卒年，经过好几百年的研究才最终确定为712和770年。^①第一次尝试编纂杜诗全集已经迟至1039年。最终编成的20卷文集包含了1405首诗歌和29篇文章。这一过程直至1667年才告结束，最终的版本包括1457首诗歌和32篇文章。

如果杜甫本人将自己的诗作清晰地注明年月，就像他对某些诗篇所作的那样；如果这些诗篇由杜甫本人由时间顺序加以编排（据记载，最早的手稿本六十卷就是如此编排的，不过这一版本在杜甫去世后不久就散佚了）；或者如果大部分可以和他当时的重要事件联系起来的诗篇没有被晦涩的隐喻和艰深的典故掩盖起来；或者如果所有流传下来的诗篇都确实可信；或者如果这些诗歌文本能够祛除历代编纂、传钞以及刊刻者的鲁鱼朱亥之误，那么，重构诗人生平的任务将会变得容易。

事实上，这一任务看似迷人，实则无望，如同七巧板拼图一般。试想一下，你手里有一袋子的不规则碎片，拼在一起，将会呈现出古罗马的城市地图，但是碎片上的线条黯淡而无法卒读。你知道还没有完成，但是许多碎片的边缘已经被老鼠啃去，某些碎片又被发现属于其他的地图，你没法确知有多少不相干的碎片掺入袋中。当你考证并比较这些碎片，在桌上把它们移来挪去，你感到万分烦恼，它们就是没法严丝合缝，

① 最早的杜甫生平梗概是元稹在813年为杜甫所作的《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这篇文字保存在《元氏长庆集》中，但这还不够，以下文本都可以参考：（a）编撰于945年的200卷《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其中全文引用了元稹所撰的墓志铭。（b）《唐文粹》中收入的元稹所撰墓志铭。（c）《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和蔡梦弼所编杜甫集中收入的元稹所撰墓志铭。（d）1814年所编1000卷《全唐文》中收入的元稹所撰墓志铭。另外，编撰于1060年225卷《新唐书》卷二百一，尽管大部分内容沿袭了《旧唐书》杜甫本传，但其中根据王洙于1039年编纂的《杜工部集》序言作了一些改动。吕大防（1027—1097）、赵子栎、蔡兴宗和鲁崑（1153）等人编撰的较早的杜甫年谱，都可以在《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和蔡梦弼所编杜甫集中找到。在稍晚的年谱中，朱鹤龄和浦起龙的作了一些新的补充。近年来中国学者所作关于杜甫的年谱和年表实在太多，不胜枚举，具有历史价值的不多。其中，闻一多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是相当用心的一部。（译者按：《少陵先生年谱会笺》载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930—1931年第一卷第一号至第四号，页189—207，247—255，477—492，691—713。）

偶尔你会激动不已，因为有不少碎片能够完全拼合。这真是一种令人着迷的游戏。

第一个试图摆弄七巧板、给杜甫建立年谱或年表的是吕大防（1027—1097）。显然，他把大部分考验他耐性太久的碎片都放回了袋子；如此一来，最后得到的年谱就过于简单，而且许多碎片还放错了位置。在吕大防之后，还有不少人也试过这个游戏。1153年，鲁岑编撰的年谱分量充实，大量杜甫生平行实被恰如其分地置于年谱中，后世学者可以欣然享用这些成果。

黄鹤是这些七巧板游戏者中最雄心勃勃的一个。他给每首诗篇贴上日期的标签，而且常常附上证据。重要的是，尽管如此，黄鹤编于1226年的版本并未按照编年顺序排列诗歌，而是保持了旧本的面目。原因很明显：那样显然将是不协调、不确定的，总之是不可能的。这个任务留给了仇兆鳌和杨伦来完成，他们按照黄鹤的编年重新编排了诗作，尽可能地前后调整了某些篇章。尽管这两人的注本刊行于1713和1791年，但其中仍有许多难点，当然，这些问题大多是黄鹤遗留下来的，不应归咎于他们。仇兆鳌的注本经过了二十四年未曾间断的修订。该书包括了对杜诗典故最为细致的解释，以及对杜诗技巧最为全面的讨论，其中尽可能地引用了前人的相关论述，当然，有时缺少敏锐的辨识力，难免繁琐。杨伦的注本则删去了他认为不切题的冗余部分，将仇兆鳌笨拙庞大的注本缩减为比较适宜的篇幅。这些，伴随着其他一些特点，例如对诗篇的进一步重新编排，对某些新解说和注释的增加，尤其是当时对钱谦益——此人我在后面会论及——注本的禁毁使得杨伦注本在一个半世纪以来广为流传。

已故的清华大学的闻一多教授尝试重新构建杜甫生平，其长篇论述刊行于1930至1931年间。闻教授相当明智，他并未将那些没有明确系年证据的诗篇加以编年，而是将关注点放在那些能够提供杜甫生平经历信息的诗篇上。不过我有点遗憾，闻教授没有注意到诗人生平思想的发展变化。他也未能充分辨识那些把我们对杜甫的理解弄得颇为糊涂的伪作。

而且，闻教授的研究有点过分依赖仇兆鳌的注本了——他没注意到杨伦注本对某些诗篇有更好的重新编年。

我曾被问起：为什么诗歌需要背负编年？我的回答既顾及一般状况，也针对特殊情形。当我们聆听鸟儿春天的歌唱，我们会对它述说的内容心有灵犀，因为我们知道并理解歌唱的背景：阳光、绿叶、灿烂的花蕊、游弋的昆虫——这一切，包括我们自己，都身处于春日的气息之中。假设我们录下鸟儿的歌声，在北极的某处播放，冰天雪地，暗夜无光，我们仍然可以设想鸟儿歌唱的背景，至少部分地欣赏其中的含义。但是一只碰巧听到这歌声的北极熊能够体会到这些含义吗？它可没有关于春天气息的任何认识。

对我们而言，诗人总是比鸟儿更容易理解。一首诗常常能自我提供背景，但这并不绝对。即使在日常谈话中，我们也需要上下文语境，以便理解辞语。一件文本信息，例如一份电报，如果不知道发送者和时间、地点，就很难理解。一首中国诗歌就很像一封电报，其中口语式的简省是意料之中的事。代词和连接词总是被省略。一两个字词常常代指一个典故，背后是极其复杂的思考和情境，需要整段文字才能阐明。

相较而言，中国诗歌的主题其实与西方诗歌类似，尽管与这些主题相关的惯用的显著修辞在两者中并不一致。亚瑟·威利（Arthur Waley）^①在他的《中国诗歌译集》（*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纽约，1919，1941）序言中不无钦羡地指出，他发现当西方诗人还在全神贯注地沉溺于爱情之际，爱情作为主题的重要性在中国诗歌中已经逊色于友谊了。关于诗歌的形式技巧方面，威利也发现传统的中西诗歌有着极其明显的相似性，主要表现在诗歌韵律和节奏上。不过，中国诗歌的节奏与音节重读的不同组合无关，而与音节声调的不同组合有关。我想补充一点，中西诗歌最显著的不同，是中国诗歌普遍的简短。中国诗人仅仅提笔写

^① 译者按：亚瑟·威利（Arthur Waley，1889—1966），英国汉学家，译有《论语》、《道德经》、《猴》（即《西游记》）、寒山诗等。

下迷狂和灵感的最高体验。戏剧能够繁复，故事可以细腻。而在诗人看来，这些细节应该尽可能留给读者去发挥创造性和想象力。

我们将遇到的杜甫是这样的一位诗人，他乐于用最精简的辞句去讲述最丰富的事物。但在我们欣赏其信息的逻辑完整性之前，我们常常不得不在字里行间去想象一个背景，去补充遗失的线索。我们对时间、地点和史实背景了解得越不精确，我们就越可能理解得不够正确，我们要不就会误解这首诗，要不就干脆没法理解它。

杜甫的绝大多数诗篇都有着社会背景。它们包含了重大的社会信息。杜甫生平的雄心是要通过施展政治才能以效力国家。即使是在他人生的最后三年中，当不断增加的疾病使得他确知所有任职朝廷的希望都付诸泡影时，他写给朋友的诗篇还总是激励他们要作良吏忠臣。他对于自己的诗才极其自信，也为自己的诗作感到骄傲。但是对他而言，诗歌仅仅是一种个人天职，而非社会职业。作一名职业诗人远非杜甫的理想——在中国，并没有这样的职业。只是在近些年来，随着商业性新闻事业的兴起，诗歌才成为可以出售的商品。

杜甫以诗为简寄给朋友。他在诗中写下自己的悲欢。一个人欢乐时，他会歌唱；杜甫在这种场合会唱出自己的歌声，有时我们几乎可以感受到他伴随歌声的手舞足蹈。一个人极度悲伤时，他会哭泣；杜甫含着泪水写下诗篇，我们常常感到他的诗行间涕泗涟涟。因为他想要做一名政治家，须臾不忘国家和人民，他的焦虑和渴求就总是和朝廷的兴衰成败、和人民的幸福与灾难、和战争与和平联系在一起。因为他的观察如此敏锐，描写如此鲜明，他的诗歌被公认为研究他所处时代历史的不可或缺的篇章。可那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啊！一个当时全世界最为辉煌的帝国，它享受过长期的宁静，拥有繁荣灿烂的文化，却忽然被抛入了最深、最混乱的漩涡，造成这一切的是政治阴谋、腐败和战争。

一位十世纪的作家写道，^① 因为杜甫的诗歌如此全面和准确地反映

① 译者按：此处应指孟棻的《本事诗序》。孟棻《本事诗序》所作时间为（转下页）

了他所在的时代，当时人已经称他为“诗史”。我怀疑杜甫诗歌对历史的重要性是否在他的时代就被意识到了。我们能看到一些杜甫的朋友写给他的诗篇，其中并没有关于诗史的暗示。杜甫的同时代人并不需要通过他的诗歌去了解他们时代的风俗和事件。然而，在半个世纪之后，在诗人的诗歌声名上升到顶峰之后，在新的一代人开始好奇他们的祖父辈所处的那个令人震惊的时代之后，杜诗中蕴含的历史意义得到了广泛地承认。

据说，文宗皇帝（827—841）喜欢读杜诗。从《哀江头》一诗中，他意识到在长安遭受战争破坏之前，曲江两岸有着许多美丽的宫殿，因此他决定加以重建。^①也许从这个时候起，学者们开始欣赏杜甫诗歌与他所处的时代历史之间的密切联系。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会发现，如果没有了历史背景，某些诗篇对我们而言将毫无意义。我们还会发现，某些诗篇将如何帮助我们补充重要的散佚史实，纠正唐史记载中令人困惑的讹误。所以说，杜诗应该尽可能以正确的编年顺序阅读，这一点极其重要。

7 一种杜诗选本，如果不是以编年形式纂辑，那么除非它的编辑意图是通过对杜诗的题材或体裁加以分门别类，以便说明杜甫的诗歌技巧，否则就不具有充足的理由。1929年由艾德纳·卫斯理·安德伍德（Edna Worthley Underwood）和朱其璜（Chi-Hwang Chu）翻译刊行的一部杜诗译本就是不具有这种充足理由的杜诗选本。它完全没有任何编排原则。有时，同一首诗被译为不同文本，冠以不同的标题，随意地被放置在290首选篇中。选译者对于杜甫诗歌的随意性有时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我还没有算上字里行间的误译和增删。当然，甚至最优秀的中国学者也常

（接上页）“光启二年十一月”，即886年。按照陈尚君《〈本事诗〉作者孟启家世生平考》考证，孟荣应为孟啟，作《本事诗》时已逾七旬。洪业先生可能是凭印象“孟荣为唐末人”而写下“十世纪”，但比较可靠的时间是“九世纪”。

① 译者按：此事见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中：“唐曲江，开元、天宝中，旁有殿宇。安史乱后尽圯废。文宗览杜甫诗云：‘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因建紫云楼、落霞亭，岁时赐宴。又诏百司于两岸建亭馆。”

常误解这首或那首杜诗。当他们将杜诗从诗歌体裁翻译为散文形式，他们也总是不得不添加许多词语，或者删去一些。诗人总能获得诗歌的特许证，杜甫就很有这个资格。话说回来，他恐怕也不能反对自己的阐释者和翻译者同样拥有那么一点特许权力，如果对方的目的只是想负责地传达自己的思想和意图。另一方面，杜甫也许很难对这样的特权鼓掌叫好，因为这往往伴随着对其作品的篡改，把一部分改头换面挪到另一部分。没准儿他还会大吃一惊，举个例子，十九世纪的法文诗用英文翻译了，居然伪装成杜诗出现。

而弗洛伦思·艾思柯（Florence Ayscough）与厄温·冯·萨克（Erwin von Zach）关于杜甫的著作则完全没有这种无中生有的例子。艾思柯女史刊行于1929和1934年的两卷本选集，包括了470多首诗，全部或部分译为英文，或多或少是按照编年顺序编排，并且相当清晰地标明了它的中文原本（杨伦《杜诗镜铨》）的页码。此后，孜孜不倦的汉学翻译者冯·萨克博士在1932到1938年出版了一部完整的杜诗德文译本，载于两期刊物和一卷附录。这一译本以张溍的《读书堂杜工部诗集注解》二十卷的正文和注释为基础，该书完成于1673年，大概刊行于1698年；诗歌译文自然也遵循同样的次序。

冯·萨克对版本的选择不像艾思柯女史那样得到过很好的建议。尽管他也研究杜甫长达二十四年，但张溍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者，他的方法比较业余。张溍版本源于许自昌题为《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的版本，该书刊行于十七世纪上半叶，追寻源头，可以上溯到高崇兰刊行于1303年的版本。寻绎诗篇的编排，可以看出张溍的版本并非直接源于高崇兰本，而高本在编年上遵循的是鲁崑本，鲁崑本对黄鹤本有轻微的修订。当然，这样的编排不能与杨伦本相提并论，因为杨伦本受益于几个世纪以来对杜诗的研究讨论。

就注释内容论，张溍本也不如杨伦本。杨伦本受益于仇兆鳌本的辛勤工作。张溍本则几乎完全承袭了高崇兰本对十一到十三世纪大量注释的删削。张溍对杜诗阐释方面的贡献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他阅读了同时